

第一次洋务运动(1860—1870)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涉外事务日增,虽然设置了中央管辖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又派驻广州、上海的“五口钦差大臣”,但倚靠办事的仍然是封建思想浓厚的官吏与洋人打交道,结果是弊病百出,无法与朝廷的意见一致。1870年(同治九年),清廷任李鸿章为“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为“南洋通商大臣”,统一处理海边防、洋务与通商事宜,这在近代史编纂中称之为“第一次洋务运动”,也就是早期洋行活动和买办资本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政”有:

1865年(同治四年),成立江南制造局(上海),其后陆续成立了金陵制造局(南京)和天津制造局,主要是引进西方兵工技术,生产武器、弹药、兵船。

1862年(同治元年),在“俄罗斯馆”的基础上开设“京师同文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文、法文,但学生只限于八旗子弟。

1863年(同治二年),根据冯桂芬的建议“上海、广州为洋人总汇,洋务为国家怀远大政,应为读书明理之人所共有……”。李鸿章奏准开办“广方言馆”亦称“广州同文馆”,教授语文、数学、理化、采矿、经济、国际法等等,程度相当于初级文理专科学校,教师全部聘请外籍人士,学期为八年。

1867年(同治六年),将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南京金陵制造局合并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并在局内设立“翻译学馆”,不久又将北京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属下的翻译机构归纳于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学馆名下,集中当年全国大部份的翻译工作人才,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当年参与该项工作的中国学者有容闳、徐寿、华衡芳、赵元益、王德均、李凤苞、贾步纬、徐建寅、钟天伟等,前后成书有二百种,印刷发行了三万余册。

在众多学者中，容闳亲身体会到美国在立国不过百余年而国民经济却获得迅猛的发展和成就，是与国民教育事业兴旺发达息息相关，因此他一再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复兴中国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以西洋文化改进中国文化”的意见。

1865年（同治四年），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回国述职，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委派他作为“中国特使”向西方游说，说“中国正在采取西方文化，步入和平进步之途”，1868年（同治七年）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 H. Seward）签订《中美续增条约》作为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入侵所签订的《天津条约》的附约，约内载明“互相优待学生”，当容闳得知条约签订后，欣喜万分，他在日记中形容“夜不能寐，竟夜开眼如夜莺，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而为床第间。”

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的联名奏请，英美两国公使的协助致意，清廷终于批准了容闳的规划，选派幼童120名，分成四批（每批30名），以十五年为期，分批派往美国官费留学。1872年（同治十一年）陈兰彬、容闳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正副公使兼留学学童正副总监，同治十年，曾国藩札委唐廷枢、徐润在上海就近协办此事，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有如下记载“冬十月，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陈荔秋（陈兰彬）容纯甫（容闳）带领去美，每班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分四年出洋，经费由海关发给，坐办（上海留美幼童出洋局）刘开生观察。”这一百二十名幼童中，广东省籍占大多数，其中有历史人物唐绍仪，詹天佑、蔡廷干、唐国安、梁敦彦、梁如浩等。